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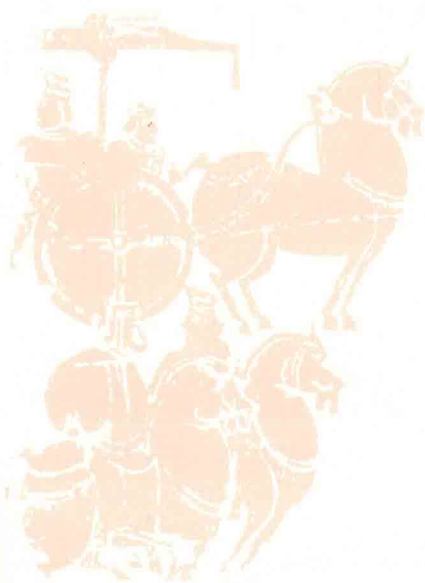
πολιτικά

政治哲學文庫

甘阳 刘小枫 | 主编

史应勇 著

《尚书》郑王比义发微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πολιτικά

政治哲學文庫

甘陽 刘小枫 | 主编

史应勇 著

《尚书》郑王比义发微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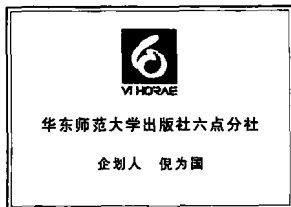
《尚书》郑王比义发微/史应勇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6

(政治哲学文库)

ISBN 978-7-5617-8585-0

I. ①尚… II. ①史… III. ①尚书—阐释学—研究
IV. ①K22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5154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政治哲学文库

《尚书》郑王比义发微

史应勇 著

责任编辑 欧雪勤

封面设计 吴正亚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总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
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11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8585-0/B·635

定 价 35.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总 序

甘 阳 刘小枫

政治哲学在今天是为含混的概念，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学业在当代大学系科中的位置亦不无尴尬。例如，政治哲学应该属于哲学系还是政治系？应当设在法学院还是文学院？对此我们或许只能回答，政治哲学既不可能囿于一个学科，更难以简化为一个专业，因为就其本性而言，政治哲学是一种超学科的学问。

在 20 世纪的相当长时期，西方大学体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没有政治哲学的位置，因为西方学界曾一度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各门实证科学或行为科学来解决，因此认为“政治哲学已经死了”。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却成了西方大学内的显学，不但哲学系、政治系、法学院，而且历史系、文学系等几乎无不辩论政治哲学问题，各种争相出场的政治哲学流派和学说亦无不具有跨院系、跨学科的活动特性。例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哲学系、政治系和法学院同样激烈地展开，“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则首先发端于历史系（共和主义史学），随后延伸至法学院、政治系和哲学系等。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为己任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学派以政治系为大本营，同时向古典学系、哲学系、法学院和历史系等扩展。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把文学系几乎变成了政治理论系，专事在

各种文本中分析种族、性别和族群等当代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福科和德里达等对“权力—知识”、“法律—暴力”以及“友爱政治”等问题的政治哲学追问，其影响遍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后，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论者要么批判西方所谓“个人”其实是“男性家主”，要么强烈挑战政治哲学以“正义”为中心无异于男性中心主义，提出政治哲学应以“关爱”为中心，等等。

以上这一光怪陆离的景观实际表明，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桎梏的特性。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哲学的论题极为广泛，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至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几乎必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达。此外，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共同体出现重大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共同关切。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谓的“60年代危机”，亦即上世纪60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而导致的西方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

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

政治哲学在中国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我们以为，从一

开始就应该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形成中国学术共同体的独立视野和批判意识。坊间已经翻译过来不少西方政治哲学教科书，虽然对教书匠和应试生不无裨益，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视野和论述往往过窄。这些教科书有些以点金术的手法，把西方从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绘成各种理想化概念的连续统，盲然不顾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古今之争”这一基本问题，亦即无视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乃起源于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拒斥与否定这一重大转折；还有些教科书则仅仅铺陈晚近以来西方学院内的琐碎争论，造成“最新的争论就是最前沿的问题”之假象，实际却恰恰缺乏历史视野，看不出当代的许多争论其实只不过是新术语争论老问题而已。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时代戒绝盲目跟风赶时髦，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

要而言之，中国学人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有必要说明，本文库两位主编虽近年来都曾着重论述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但我们决无意主张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应该简单化为遵循施特劳斯派路向。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深入分析和批判。同样，我们虽强调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传统的重要性，却从不主张简单地以古典拒斥现代。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而言，我们以为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各主要流派近年来实际都在以不同方式寻求现代思想与古典思想的调和或互补。

以自由主义学派而言，近年来明显从以往一切讨论立足于“权利”而日益转向突出强调“美德”，其具体路向往往表现为寻求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结合。共和主义学派则从早年强调古希腊到马基雅维里的政治传统逐渐转向强调罗马尤其是西塞罗对西

方早期现代的影响,其目的实际是缓和古典共和主义与现代社会之张力。最后,施特劳斯学派虽然一向立足于柏拉图路向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而深刻批判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批判并非简单地否定现代,而是力图以古典传统来矫正现代思想的偏颇和极端。当然,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各派仍然对古典和现代都持激进的否定性批判态势。但我们要强调,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各种流派无不从西方国家自身的问题出发,因而必然具有“狭隘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的特点,中国学人当然不应该成为任何一派的盲从信徒,而应以中国学术共同体为依托,树立对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总体性批判视野。

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深入地重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尤其是儒家这一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历代儒家先贤对理想治道和王道政治的不懈追求,对暴君和专制的强烈批判以及儒家高度强调礼制、仪式、程序和规范的古典法制精神,都有待今人从现代的角度深入探讨、疏理和发展。近百年来粗暴地全盘否定中国古典文明的风气,尤其那种极其轻佻地以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标签一笔抹煞中国古典政治传统的习气,实乃现代人的无知狂妄病,必须彻底扭转。另一方面,我们也并不同意晚近出现的矫枉过正,即以过分理想化的方式来看待儒家,似乎儒家或中国古典传统不但与现代世界没有矛盾,还包含了解决一切现代问题的答案,甚至以儒家传统来否定“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传统。深入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应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同时,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倒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和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固然将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古典文明为源头,但同时必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政治哲学的研究既要求不

断返回问题源头,不断重读古代经典,不断重新展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前的古老争论,又要求所有对古典思想的开展,以现代的问题意识为归依。古老的文明中国如今已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国家,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批判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还是深入疏理中国政治哲学传统,都有待学界同仁共同努力,逐渐积累研究成果。但我们相信,置身于21世纪开端的中国学人正在萌发一种新的文明自觉,这必将首先体现为政治哲学的叩问。我们希望,这套文库以平实的学风为我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个起点,推动中国政治哲学逐渐成熟。

2005 年夏

序 一

郑玄与王肃，两人都是中国经学史上的达才通人。

郑学兴起于东汉。郑玄早年往太学受业，师事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等今文学，再从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等，又西入关，师从马融学古文学。十余年后，郑玄回归高密乡里，“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其学之盛可见。党锢之祸后，郑玄潜心于学术，遍注群经，所注有《周易》《尚书》《毛诗》《三礼》《论语》《孝经》等，凡百余万言。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其著述之富可见。范晔的祖父范宁“每考先儒经训，而长于玄，常以为仲尼之门不能过也”（《后汉书·郑玄传》），其学殖之精可见。郑玄博闻强识，著作等身，不慕权势，不受朝服，究心于经术，卓行高节，为天下景仰，从学者盈千累万，人称伊洛以东，淮汉以北，仅此一入而已，乃中国经学史上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

王学兴起于三国魏。王肃出身于经学门第，其父王朗，“以通经拜郎中，除菑丘长”，著《易》《春秋》《孝经》《周官》传等，“咸传于

世”(《三国志·魏书本传》),为三国时期经学名家。王肃亦擅长经学,曾“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传》解”(《三国志·魏书本传》),成为当时遍注群经的名家。王学试图挑战郑玄经学盟主的地位,故其经注处处与郑玄立异,太多的敌忾之气。王肃将女儿嫁与晋文帝司马昭,彼此联姻,炙手可热,由此参预朝政,官至太常,总领五经博士,并挟势将自己所注经籍尽行列入学官,与郑学等博士并列,从而得官学地位,其学大盛,风靡一时。

王肃编集《圣证论》,以此讥短郑玄。与王肃论战的是孙叔然。孙叔然是郑玄的再传弟子,学识博洽,人称“东州大儒”,面对王肃之论,他“驳而释之”(《三国志·魏书》王肃本传),并对《周易》《春秋》《毛诗》等经典做了新注。王学来势很猛,消退也很迅速。由于司马氏政声极之不善,数十年而亡,王学随之烟消云散,终究未能撼动郑学的地位。

“郑王之争”历时不长,但彼此交战的焦点却每每集中于郊祀、鬯丘、禘祫、桃庙等经学研究的重大问题上,因而历来受到学界的关注。由于王肃的人品与学品与郑玄恰成鲜明对比,学者间不免以褒郑抑王者居多。不过,许多个案研究表明,二氏在经学上的是非,不能一概而论,郑是而王非者固然不少,王是而郑非者也并不鲜见。王氏有王氏的问题,郑氏也有郑氏的问题,学术研究不能因人废言,当如荀子所说,“是是非非”,始可求得尽可能公正的评价。

“郑王之争”,给后人留下的看点不在少数,例如,郑玄与王肃,都是遍注群经的大家,都是兼采今古文而偏向于古文经学,其学术观点何以大相径庭?《三国志·魏书》王肃本传说,王肃的经学旨趣是“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言下之意是,贾、马之学与郑玄之学迥然有别。但是,熟悉郑玄的人都知道,郑氏与马融的关系远较王肃为深,郑氏曾经师从马融,登堂入室,受其亲炙。王肃之于马融,年代遥隔,至多不过是私淑而已。王肃操马融之戈以伐郑玄,殊觉

不可解。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需要作全面的研究来加以廓清。所幸的是，台湾学者李振兴先生的大作《王肃与经学》一书，专就王学与马融学说的关系作系统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当然，由于王肃的著作几乎都已亡佚，学者只能从后世的注疏中窥见其说之梗概，研究上有相当的难度，故学界对“郑王之争”的研究总体上显得比较寂寥。令人欣喜的是，大陆学者史应勇先生矢志于“郑王之争”的研究，三年前，即以《郑玄通学及郑王之争研究》稿本见示，并索序于我。如今又以《尚书郑王比义发微》稿本见示，并再次邀序。此书并非简单的资料罗列与对比，不少残存的郑王之注，不容易真正读懂，需要会通伪孔传、《经典释文》、《尚书正义》，方能得出结论。作者是在李振兴先生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深耕细作，厘订补充，因而后出转精，成为目前有关《尚书》“郑王之争”资料搜罗最为齐全的本子。不仅如此，作者在比勘郑王异同的基础上，时出新说。史先生告知，渠有心就郑王交锋的每一部著作做逐条比勘，此书是其宏大研究规划之第一步，其后将就《毛诗》《周官》等书逐一展开，渠弘道之坚韧果毅，自甘寂寞，令人不能不有“后生可畏”之叹！

经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主体，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等等的理论形态，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意义非同一般。经学研究的程度如何，直接关乎人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近代的经学研究不绝如缕，悬于一线，荒芜积久，需要垦殖之地尤多。我们有理由相信，像史应勇这样坚毅的经学拓荒者，一定会群起而辈出之，中国经学在经历多年的沉寂之后，必将迎来经学研究的辉煌时代。

是为序。

彭林

2010年3月27日于清华园

序 二

学术史由多维因素交织而成，方闪烁一现，即倏忽而逝，旋遗无穷疑玄，扰人神思，费人猜想。郑玄与王肃之经学纷争，即为典型一例。建安五年（200），一代宗师郑康成（142—200）下世时，王子雍（195—256）年仅五岁。子雍“成童始志于学，而学郑氏学”，至嘉平间作《家语序》而云“郑氏学行五十载矣”，知康成虽弃捐而其学则盛行于世，故童稚启蒙，无不习之。然经典由先秦专述微言大义之“传”，进而演为西汉中期繁琐之“章句”，复蜕演为东汉专重名物典制训诂之“注”，此皆由传注体式之内因与政治、经济、社会之外因同时作用之结果。东汉末年以至三国鼎立数十年间，今古文之界划渐趋泯灭，此郑康成与有功焉；官学渐趋没落而地方之学兴盛一时，此刘景升与有力焉。康成糅合古今，偃息纷争，遍注群经，独成一家，弛声北疆，引领风骚。而景升“广开靡泮，设俎豆，陈黻彝，亲行乡射，跻彼公堂。笃志好学，吏民子弟受学之徒盖以千计。洪生巨儒，朝夕讲海，閤閤如也”，由是形成荆州学派。景升主持风会，以南阳宋忠为领袖，“延朋徒”开讲授业，一时

名儒自四方至者几数百人。就中王粲、王凯系刘表之友王畅之孙，自然归依。至后进英髦如王肃、尹默、李仁、潘浚辈，亦翕然从忠授业。王粲《汉末英雄记》云：“州界群寇既尽，表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闾、宋忠等撰定《五经章句》，谓之‘后定’。”卢弼以为“后定”犹“新定”。五经章句本官方今学，自西汉末、东汉初已几经删减，诏定一经在二十万字许。刘表、宋忠等所以要重新撰定，应如《刘镇南碑》所云景升“深愍末学远本离实，乃令诸儒改定五经章句，删划浮辞，艾除烦重”。一百余年后，荆州学派犹以官定章句为繁而进一步删浮辞，削烦重，可见刘、宋学术质简之风格。《华阳国志》谓宋忠传古学，则新定《五经章句》中亦必有古学传记之内容，故其典献虽湮灭，而忠学简化章句，以解说义理直挾经典本意之方式似略可推知。康成之学虽亦熔铸古今，简化经说，然其注重典制名物，以“注”之形式训解经典，且牵引五行、讖纬以说经，未尽脱东汉窠臼，是以“通人颇讥其繁”。缘此已可知西南荆州之学与东北高密之学虽皆糅合古今，而旨趣宗尚亦微有不同。及至弟子各守门户，攻诂异端，纷争乃起。

《三国志·蜀志·李譔》云：“李譔字钦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贤，与同县尹默俱游荆州，从司马徽、宋忠等学。譔具传其业，又从默讲论义理，五经、诸子无不该览”。“延熙元年(238)，后主立太子，以譔为庶子，迁为仆射，转中散大夫右中郎将，犹侍太子”。“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与王氏殊隔，初不见其所述，而意归多同。景耀中(258—262)卒”。譔尽传父业，又从默讲论义理，是其学出于刘、宋荆州学派之再传。《魏志·王肃传》云：“年十八，从宋忠读《太玄》，而更为之解。”是肃乃忠之嫡传，故史载“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肃之“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与譔之“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如出一辙。譔之

学于肃为晚辈，故本传言其“与王氏殊隔，初不见其所述，而意归多同”，盖意其非袭取王说，是皆本之于忠也。仲宣依刘表，识宋忠，沃闻其学，而嗟怪郑注《尚书》意犹未尽。此皆足见宋忠及荆州学派经学旨要与高密郑学确有违异。抑不仅如此，虞翻曾“奏郑玄解《尚书》违失事目”，又云“玄所注《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学校，传乎将来，臣窃耻之”。翻虽狂直，然亦可窥汉末虽郑学风行，而学者不无微词。

学术异同，本无可诧异。其所以引起纷争，亦与个人性格、学术氛围、政治动荡等因素相关。譔遍注五经，异于郑学，而与“师事刘熙，善郑氏学”，且亦“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之许慈同立刘蜀后主朝。慈“矜己妬彼”，与胡潜“更相克伐，谤讟忿争”，而譔与慈是否有异同争论事，史阙未闻，即有辩驳，亦随蜀国鼎覆而湮灭。翻持独见，而身窜海隅，虽传弟子，无法抗衡中原。至于子雍，尊为司马昭之岳丈，官居高位，亲炙名师，遍注群经，陈寿谓其“性嗜荣贵而不求苟合”。其于郑学自解云：“然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不谓其苟驳前师，以见异于前人，乃慨然而叹曰：‘予岂好难哉？予不得已也！’”性既不求苟合，师承复异郑学，故虽少习而终至驳难。学术之异同驳质，先秦诸子、两汉经师已肇其端，然魏晋之际之所以形成郑、王之学而未形成郑李、郑虞之学，除却王肃好胜性格、学术异趣及政治地位，亦与郑王弟子之卫护、坚守师说，互相攻讦有关。

方康成甫歿，仲宣即有《尚书问》之讦难。郑门弟子田琼、韩益申明师说，遂有《尚书释问》之书。是笃守师说，攻讦异端肇始于斯。郑说行五十年，而“王肃著诸经传解及论定朝仪，改易郑玄旧说”，郑门再传弟子王基“据持玄义，常与抗衡”。似壁垒已成。及肃作《圣证论》以讥短康成，郑门再传孙叔然“驳而释之”；肃“规玄数十百件”，守郑学之博士马昭亦“上书以为肃缪”。高贵乡公

曹髦于是“诏王学之辈占答以闻，又遣博士张融案经论诂。融登召集，分别推处，理之是非，具《圣证论》”。《隋志》又有“《尚书王氏传问》二卷、《尚书义》二卷，范顺问，吴大尉刘毅答”。此则孙吴学者有关郑王之义问答也。经师异议，弟子恪守，帝王复诏议之，遂开启六朝南王北郑经学对峙之局面。冲远领衔纂辑《正义》，融合南北，折衷郑王。然刘子玄犹云：“至若郑玄、王肃，述五经而各异；何休、马融，论三传而竞爽。欲加商榷，其流实烦。”盖折衷融合，意在著者主观取舍，而欲客观裁断是非，则非并陈两说，条分缕析，旁征博引，以归一是不可。惜乎唐宋已还，虽有学者引为谈资，而竟无人专事比勘。有清乾嘉学人董理经义，辑佚汉注，勾稽书志，于郑王学述优劣时有评鹭。若张皋文云：“肃著书务排郑氏，其托于贾、马以抑郑而已。故于《易》义马、郑不同者则从马，马与郑同则并背马”，“然其训诂大义则出于马、郑者十七，盖《易注》本其父朗所为，肃更撰定。疑其出于马、郑者，朗之学也；其掎击马、郑者，肃之学也。”马竹吾云：“肃既撰《毛诗义驳》，专攻郑氏……康成大儒，先通鲁、韩二家，后笺《毛诗》，其与毛不尽同者，意在两存其是，肃必欲尽废郑说，驳之不已，复陈诸奏，何见疾之深乎？”孙仲容亦以为郊社禘祫，郑是而王非；庙制昏期，则王长而郑短。侯君模云：“王肃解经，平易近人，故晋宋以下多从之。近世崇尚郑学攻肃者，几于身无完肤。平心而论，肃解经岂无一得，其立异于郑，犹郑立异于贾、马，何许此得彼失？”诸儒固皆专门名家，观其所云或袒郑护王，或析是论非，然皆示君鸳鸯，深秘金针，使人莫知所据。

降及近代，学术丕变，专著专论，继踵迭出。吴承仕作《尚书传王孔异同考》，陈品卿作《尚书郑氏学》，许春雄作《王肃之尚书学》，李威熊作《马融之经学》，李振兴作《王肃之经学》。吴氏《异同考》录得王肃义二百三十五条，其中同于孔传者百有七事，异于孔传者百二十八事。陈书专论郑学，搜集清人辑本，校勘精良，鲜

及王注。许作则意在王学。二李之书，抉摘马、王《易》《书》《诗》《三礼》《春秋》（王氏为《左传》）《孝经》《论语》之佚文，条分缕析，殿以评述案断。其于马、郑、王之经学异同，多辅以表谱形式图示之。唯各有侧重，非直接评判，故郑、王学术，仍有待发覆以见泾渭。

予友史君应勇沉潜笃实，不务声华，转益名师，不以自多。方其攻博复旦，即以《郑玄礼学的经学史考察》为题；旋又负笈川大，仍以《郑玄通学及郑王之争研究》为务；既而执教江南，乃著成《尚书郑王比义发微》书稿。是其浸想郑学已十有余年矣。《研究》一书，区为四类，第四篇为“郑王之争”，纂辑郑玄、王肃《周易》《尚书》《毛诗》《丧服》《礼记》《论语》六种经注佚文，两相比勘，简单案断，而后归纳要点，并作文化史分析。此篇引言有云：王肃所以遍注群经与郑玄立异，殆其于经学之体认与郑不同。作者对时下学者未谨慎考虑留存之郑王经注佚文率尔所作之宏观评说颇不以为然。故其搜辑罗列郑王经注残句佚文，谓“今后可逐一结合孔疏予以研究”。《发微》一书，即其结合孔疏研究之第一种。

《发微》缘《研究》所列之郑王《尚书》注文比勘申论，而实际于《研究》所列之基础上更事搜辑，《研究》所列郑王《尚书》注文不足五十条，而《发微》则达一百二三十条，殆为原先二倍有余。《发微》旨在比郑王之义，故或备列原文，或撮举义旨，务使一目了然。其迻录孔传孔疏原文，意在广事比勘，而摘抄李振兴案语，则示不略人美，略存学术史迹之意。若李案有误或所见不同，更直抒己见，盖争鸣求是不稍宽假也。

评议经注异同，殊非易事。古人经注，有师承来源、经义体认及遣词表述诸多不同；复有后人注解，有意转换视角，变换词汇、短语、句式等以求异于前注，而理解则一。应勇兄注意及此，于郑王之说，多仔细比勘而条理之，标识异点，而后一一疏通证明；其于李说评判含混处，亦时有修正。

《发微》引录孔传及孔疏文以事勘同，另有一重特别意义，即孔传与王肃之关系。自《释文序录》有“王肃亦注今文，而解大与古文相类，或肃私见《孔传》而秘之乎”之疑，清代惠定宇、王西庄皆疑王肃伪作，至丁晏更出四证以实之。一时吠影随声，不一而足。虽陈澧举《禹贡》“三百里蛮”、《洪范》“农用八政”二条孔王之异，以证“似非王肃作也”。吴承仕作《异同考》，罗列事实，摧破丁说，至今犹有疑云浑水。鄙意《发微》既已一一比义评议，于王、孔违异亦时加点明，若能取元朗以来旧说，叙其源流，指其得失，则非唯可进一步澄清、了断此案，抑或亦可发微显幽，于《尚书》学史不无裨益也。

《隋志》有王肃《尚书注》十一卷，又有《尚书驳议》五卷，二书不知其作之先后，要皆子雍求异康成、驳议郑说者。《发微》既专事评议郑王，于王肃之书，自当指明坐实。如《书·禹贡》“二百里流”孔疏：“故肃注此云：‘贾、马既失其实，郑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广土。土地之广三倍于尧，而书传无称也，则郑玄创造，难可据信。汉之孝武，疲弊中国，甘心夷狄，天下户口，至减大半，然后仅开缘边之郡而已。禹方忧洪水，三过其门不入，未暇以征伐为事，且其所以为服之名，轻重颠倒，远近失所，难得而通矣。先王规方千里以为甸服，其余均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吏（使）甸服之外诸侯入禾稌，非其义也。史迁之旨，盖得之矣。是同于孔也。若然，《周礼》王畿之外别有九服，服别五百里，是为方万里，复以何故三倍于尧？’又《地理志》言……”此段文字《诗·商颂·殷武》孔疏引至“是同于孔也”，无“若然”三十字一句。“何故三倍于尧”问句承接上文郑注之意，亦子雍注文。是整段皆王说，而黄怀信标点本仅将“贾、马既失其实，郑玄尤不然矣”十二字为王注，其它为孔疏，固失检误断。观整段文字不似汉魏经注，程元敏谓为王肃《尚书驳议》文，不为未见。然《殷武》孔疏前云“王肃注《尚书》，总诸义而论之云”，则所